



当代新儒家与 当代中国和世界

郭齐勇 主编

当代新儒家始终坚持一种开放的立场，努力使传统儒学融入现代，积极回应当代中国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当代新儒家与当代中国和世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新儒家与当代中国和世界/郭齐勇主编

.- 贵阳: 孔学堂书局有限公司, 2017.9

ISBN 978-7-80770-081-4

I. ①当… II. ①郭… III. ①新儒学-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B26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7147号

当代新儒家与当代中国和世界 郭齐勇/主编

出品人 邓国超 李 筑

项目执行 张忠兰

责任编辑 张忠兰 李朝辉

封面设计 梁诗吉

排版制作 陈思蓓 谢白杨

责任印制 张 莹

出 品 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孔学堂书局

地 址 贵阳市乌当区大坡路26号

印 制 深圳市泰和精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87mm×1092mm

印 张 23.75

字 数 484千字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80770-081-4

定 价 59.00元

前言

郭齐勇 廖晓炜

当代新儒家自20世纪初期产生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逐渐发展成为东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思潮，迄今仍在进一步发展中。面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危机，当代新儒家坚持文化守成主义的立场，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路向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本质上，当代新儒家的这项工作乃是希望透过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双向批判确立一儒家式的现代性，换言之，也就是在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人文世界予以全面地重建，探索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化的可能性。在这一大的问题意识的驱动下，当代新儒家在诸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具有典范意义的成就。

当代新儒家对中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诠释。不论是牟宗三的《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抑或是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等，无不是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为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这一大型研究计划的推动下，上述当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被广泛介绍到中国大陆，极大地推动和深化了大陆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

儒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自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一直在热烈讨论的重要议题。新儒家在反省儒家文化精神以及现代民主政治所蕴含之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观念之内涵的基础上，对儒家与民主的关系做了极为深入地探讨，充分论证了儒家式的民主（Confucian democracy）的可能性及其善化现代民主实践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当代新儒家有关儒家政治哲学的思考，不仅改变了自“五四”以来人们对儒家的错误理解，更为积极地，也为我们重新思考政治哲

*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
廖晓炜，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讲师，哲学博士。

学的诸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儒学之宗教性问题也是当代新儒家特别是第二、三代新儒家极为关注的课题。针对现代人类共同面对的意义危机，当代新儒家从存在的进路重建儒家形上学并发掘其中所蕴含的超越性意涵，以内在超越观念为基础，阐扬儒家宗教性的深刻内涵。事实上，这也是当代新儒家在理论上的最重要的创建。第三代新儒家刘述先、杜维明等学者更是将新儒家的上述研究广泛传播到英语世界，这不只纠正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认为儒家缺乏超越性的错误看法，同时也为儒家与世界其他各大文明之间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当然，当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远不止于此。不过由上述几点，可以看到，当代新儒家始终坚持一种开放的立场，努力使传统儒学融入现代，积极回应当代中国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近年来，也有学者将当代新儒家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儒学重建工作视为变相的西化，要求将儒学研究转变为一种纯粹中国化的叙事，因而极力否定当代新儒家的工作。诚如劳思光先生所言，“世界中的中国”乃是我们思考今日中国问题无法逃避的背景。使儒学自绝于世界的原教旨主义立场，只能将儒学带回到自我封闭的境地，这绝非儒学之当代发展所应遵循的道路。今日中国大陆显示出儒学复兴的种种迹象，儒学的理论创构、学术研究及其在民间的开展都有不少突破。在此背景下，我们更加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继承和推进当代新儒家的学术成就，使儒学能更健康地发展。

2016年3月，武汉大学国学院联合台湾鹅湖人文书院、湖北省政府文史馆、湖北国学馆、黄冈师范学院、黄冈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举办了“当代新儒家与当代中国和世界”学术研讨会。本书所收论文即会后经各位学者认真修订过的会议论文。这些论文主要以第一、二代当代新儒家为研究对象，或从宏观角度探讨当代新儒家的思想对现代社会、政治及人类心灵的积极意义，或从个案出发具体探讨熊十力、徐复观、牟宗三等新儒家学者思想的各个方面。这些论文讨论的问题及其视角各有差异，但都努力客观呈现当代新儒家思想不同方面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于当下的儒学复兴而言，这些讨论无疑具有较大的意义。

前言

上编

现代鄂东的名流学者及文化现象／郭齐勇

002

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朱建民

021

中国政道的传统理想和问题及现代民主
——熊十力、徐复观和孙中山／潘朝阳

025

慎言超越新儒家——我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和总体看法／胡治洪

053

湖北的儒学底蕴及当代研究／王玉德

058

文化融合：现代新儒家的努力／王林伟

068

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再论新儒学对人类心灵的穿透力／周博裕

075

儒家身体观的新视野／刘芝庆

083

数位人文视野下的儒学研究／邱伟云、金观涛

096

／刘青峰、刘昭麟、黄植琨

下编

熊十力《明心篇》的『心』论／周海春

116

从熊十力的智识之辨到牟宗三的坎陷论／肖雄

125

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熊十力、怀特海及
中西文化融摄会通的新契机／郭海鹏

139

熊十力先生教育思想述要／刘莉莎

155

徐复观先生的思想史观／郭齐勇

168

徐复观先生之生平及其儒学性格／黄兆强

187

徐复观的军政生涯事略：1932~1951
／杨诚、徐武军

204

徐复观先生先秦儒家政治思想诠释述略／宋立林

213

『学术与政治之间』——徐复观的文化观／廖璨璨

226

作为史家的新儒家——论徐复观与熊十力的歧异及其思想史策略／王晨光	237
有关牟宗三先生圆善论的一些思考／杨祖汉	254
牟宗三对儒佛圆教的定位／徐波	266
圆教的『所性』与当代的『虚无』／陈有志	274
略论牟宗三先生的哲学贡献／郭继民	287
胡秋原与现代新儒家／谢远笋	299
胡秋原与现代新儒家的交往与异见／介江岭	304
作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家——贺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田文军	315

梁漱溟文化哲学片论／黄敦兵	325
坚守与嬗变之间——梁启超孟学研究的张少恩	334
张謇的儒学思想述略／梁林军	347
论唐枢的『讨真心』说／姚才刚／张黎	359
附录	
『当代新儒家与当代中国和世界』学术研讨会综述／刘莉莎	370

当代新儒家与当代中国和世界

夏文井 编

明方 设计



上编

现代鄂东的名流学者 及文化现象

郭齐勇

今天我们海峡两岸的学者云集古城黄州，共同缅怀黄冈熊十力（1885—1968）、浠水徐复观（1903—1982）二位现代新儒学大师，讨论儒学在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问题，实乃学林盛事！熊先生、徐先生的生命所映现出来的圣贤人格是吾人孜孜以求的目标，重温现当代新儒学大师们的学问与人生，从中汲取营养，使我们的生命有所受用，是参与本次高端论坛的同仁们的殷殷期盼。在下不揣鄙陋，就熊、徐等先生所处的鄂东文化背景，略抒管见，就教于各位先进、方家、同仁与青年。

一、引言

与居恭色庄的新儒学大师相比，熊先生带有鄂东的乡土气息，斯文中略显朴拙、狂放、随性。抗战时期，一次在后方听到误传的消息，说他的兄弟子侄遭日本飞机轰炸遇难，他顿时嚎啕大哭起来！1944年春节，大年初四，弟子们专程来到他的住地为他祝六十寿辰，他突起悲心，情不能已，大哭不止，寿庆活动不得不打住。

情感丰富的熊先生同时又是理性思维一流的哲学家，当然他的理性活动并不排斥感性直觉与智性直观。他终其一生都在营造他的本体哲学，从儒家哲学的思想资源里发掘并重建了“大本大源”。他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即是“明示本体”，哲学“以本体论为其领域”。他所说的“本体”是什么呢？“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

*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

也”，“盖自孔孟以迄宋明诸师，无不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源、万有之基。即此仁体，无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①如同“仁”“本心”“良知”，熊先生之“本体”，不是“自然本体”，而是生生不已的、刚健运动的“生命本体”。

熊先生大谈本体论问题，尤其是把儒家哲学的内核——内圣之学中所探讨的心性关系问题、道德哲学的问题、人的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终极寄托的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关于人的存在的问题），把从先秦到宋明儒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加以系统化、体系化，同时又投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部生命，从而在中国儒学史上第一次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标志他的儒家哲学体系。熊先生说“体用不二”之论是“自家体认出来的”。

徐复观是“大地的儿子”，临终前呼唤着他的母亲，他的故乡。在脍炙人口的《谁赋幽风七月篇——农村的回忆》一文中，他把土生土长的农村看成是中国人的生命的源泉。他又说，他的生命永远是和浠水故地的“我那破落的馊子”连在一起的。

陈昭瑛教授曾经指出，徐先生是“激进的儒家”，熊十力与唐、牟是“超越的儒家”，认为徐先生是“以人、人民为根本去掌握事物的儒家”，而熊、唐、牟则是“从超越的、先验的方面去掌握事物”^②。黄俊杰教授说，陈教授的这一对比，“虽然不免因过于二分而稍嫌僵硬，但是却很能道出徐与唐、牟的基本差异之所在。唐、牟有心于建构道德形上学的体系，徐复观则有某种反形上学的倾向”，“徐复观注意到中国思想多来自具体的生活体验，而非客观的逻辑推理”。^③徐先生作为思想史研究大家，在研究过程中当然有客观的逻辑推理，黄俊杰先生在此处是强调徐先生反对唯科学主义的方式，反对以西方哲学思辨作为唯一标准衡量中国哲学思想，反对“知识的游戏”，忽视了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及人的生存体验。徐先生从具体生命、生活上去接近孔子等思想大家，肯定儒家思想是从人类现实生活的正面来对人类负责的思想。

徐先生一生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他是风骨嶙峋的勇者型的人物，时常批评政治，在政治上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有道德勇气。他肯定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徐先生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批评、指

①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7—398页。

②陈昭瑛：《一个时代的开始：激进的儒家徐复观先生》，收入徐复观：《徐复观文存》，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第366页。

③黄俊杰：《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徐复观及其思想》，（台湾）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第31、33页。



导、提升社会政治的品格。在文化上，他是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的执着守护者，曾誓言“要为中国文化当披麻戴孝的最后的孝子”。

作为思想史家的徐复观，主要创获与贡献在于疏理先秦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和中国艺术精神方面。他对中国思想史的总体，特别是先秦两汉思想史、中国艺术史下了极大的功夫，有精到的研究。他的政论杂文亦十分丰富，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的影响甚巨。他在如下两方面不同于唐、牟：一是他乃思想史家而不是哲学家；二是他乃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最具有现实批判精神、最易于与自由主义思潮相颀颀又相呼应、相融洽的代表人物。

黄侃、王葆心、熊十力、汤用彤、徐复观、胡秋原等都是鄂东人。鄂东是现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及其中坚——现代新儒家的渊藪。我们拟略为讨论他们出生地的文化传统与氛围，以期了解他们的人与思想之所从出。

巍巍大别山和奔腾长江水之间夹着鄂东黄冈地区（旧黄州府）。它北抵河南，南靠江西，东与安徽接壤，西与九省通衢的武汉毗邻。山川瑰丽，英气凝聚，人文荟萃，云蒸霞蔚。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代词宗、豪放派首领苏轼的代表作《念奴娇》就是被贬于黄州时写下的。鄂东的风流人物，史不绝书。远的如世界著名的药物学家李时珍就曾生于斯，长于斯。明清两代，这里出了1800名进士，几占鄂省之一半。近现代史上，此地更是人杰辈出。其中有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有闻名全球的学问家、科学家。参加辛亥革命的鄂东志士百余人，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与解放军高级将领中，鄂东籍竟有数百位之多。

近现代鄂东的名流学者有：王葆心、黄侃、李四光、熊十力、闻一多、汤用彤、王亚南、胡风、徐复观、殷海光、冯文炳、叶君健、胡秋原等。下面我们分四个类别（国学大师、思想家、学者、文学家），以通俗的讲法，略为介绍这十三位大师，最后作一小结。当然，这个分类是粗略的，有一点勉强，因为他们之中有人既是学者，又是文学家或者思想家。

二、国学大师——王葆心、黄侃

王葆心（1867—1944），字季芑，号晦堂，罗田人，国学大师。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后入黄州经心书院读书，府考以经学第一名录取为秀才，后入两湖书院深造。民国时期历任北京图书馆总纂、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武昌高等师范（武

汉大学前身)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其间兼任湖北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处主任、《湖北通志》总纂。

清季,目击政府腐败,外侮凌逼,发愤撰《宋季淮西六寨纪事》和《圻黄四十八寨纪事》(后增订为《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搜遗辑佚,将宋明末季楚东人民不畏强暴和抗拒侵略的壮烈故事,整理成为条理清晰和情节生动的史著,用以补正史缺失、宣扬民族气节、鼓舞人民抵御外侮。

1932年就任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兼总纂。广搜博览全国志书达1400余卷,将所载内容同有关历史地理资料查对考证,辨抄袭和证谬误、审体例、寻因革,找出其中融会贯通的脉络和体例变革的原因和切实可行的经验,撰写为《方志学发微》一书。成书前,先撰写《重修湖北通志条本》一卷问世,为当时修湖北志方案。抗战前,因为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平津危急、为抢救湖北通志所需材料,先生曾多次北上。第三次在北平选抄材料时,“七七事变”发生,北平沦陷,先生携带手抄稿,备历艰辛、间道返汉。是年退居罗田故里,任县志馆馆长。

季芑先生治学严谨,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均有研究。晚年于方志一门致力尤勤,遗著达170余种,是著名的方志学家。董必武多次指示搜集、保存、整理和出版其遗著,并亲笔题写“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以表墓门。

黄侃(1886—1935),字季刚,蕲春人,国学大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在经学、文学、哲学,特别是音韵学与训诂学方面造诣甚深。历任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中华大学、东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创立了我国古文字音韵学的理论体系与学派,即“章黄学派”。“章”即章太炎,黄侃曾拜章太炎、刘师培为师。程千帆先生说:“季刚老师的学问是既博且专的。无论你用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辞章来分类,老师都不仅有异常丰富的知识,而且有非常精辟的发明。他在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

黄侃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不肯轻易写书,生前曾说:“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五十岁以前不著书”,结果他死于五十岁。他的《三礼通论》《声类目》等已写定,其它书稿凌乱。他读书破万卷,在书籍的天头地脚写有大量的批注。现有影印《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与后人整理出来的著作《文心雕龙杂记》《黄侃论学杂著》等书。他一生瞧不上一些人读书浮光掠影,不能坚持把一部书从头到尾读完,讥讽为“煞书头”。他临终前因胃溃疡大吐血,但仍坚持把正在读的一部书圈点完毕,才撒手归西。

他曾与宋教仁等一道参加反清革命,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系列文章。1911年为《大江报》写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直言造反,鼓荡



民气，风传三镇，致使当局恼羞成怒，查封报馆，逮捕正、副主编，酿成“大江报案”，成为武昌起义的序曲。1915年，刘师培等筹安会拥立袁世凯称帝，拉拢知识分子，黄侃坚不参加，影响了很多知识人。与刘师培相比，黄侃一生在大事上从不糊涂，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洁身自好。晚年黄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非常愤慨，深忧国难。

三、学者——李四光、王亚南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原名仲揆，黄冈人，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首创地质力学，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家贫，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候执教的私塾，14岁来武昌读高等小学堂，年轻时留学日本，是同盟会最小的会员。辛亥革命后，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18年回国效力，任教于北京大学。1928年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部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选定武汉大学的珞珈山校址。1950年后，李四光历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中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有：古生物蜓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他根据数十年来地质力学的研究，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出发，向毛泽东、周恩来分析了我国地质条件，认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他指出，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黄海、东海和南海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在1966年邢台大地震后，李四光指出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渤海、云南通海、四川炉霍、云南的彝良大关、松潘、唐山……，都被李四光言中。当时很多科学家认为地震是无法预报的，李四光斩钉截铁地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辛亥革命胜利的当年腊月，为庆祝光复，黄冈四杰——吴崑、刘子通、李四光与熊十力聚会于武昌雄楚楼。为抒发心志，共出一纸，顺次挥毫。吴崑书李白《山中问答》诗：“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刘子通发挥老子思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若



有心若无心，飘飘然飞过数十寒暑。”李四光书：“雄视三楚。”熊十力书：“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王亚南（1901—1969），黄冈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历任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王亚南父母早逝，在兄长支持下，他在黄州读完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第一中学，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大革命中，他投笔从戎，在长沙参加了北伐军，曾在军中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来到杭州，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在这里，他结识了他事业上的重要伙伴——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同样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两个年轻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畅谈人生理想，很快结为至交。在此期间，王亚南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找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郭大力见他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建议两人一起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从此，他和郭大力开始了近四十年的友谊与事业的合作。《资本论》也成了王亚南终身学习和研究的经典。

1933年王亚南因参与“福建事变”被通缉而亡命欧洲。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在《资本论》的诞生地英国，他广泛收集西方经济学资料，注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向，同时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1935年他回到上海，和郭大力着手正式翻译《资本论》。1938年在经济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滋润的中国这块干涸的土地上，王亚南和郭大力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有了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基石《资本论》三卷中文译本终于出版了！这不仅是中国经济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鲜事物，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王亚南和郭大力用10年心血，克服重重困难，是马克思主义学在中国系统传播的里程碑。

王亚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亚南一生中最为杰出的贡献，是对中国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专著：《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

王亚南在经济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极力倡导“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他认为经济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应该面对中国的实际，使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建立“中国经济学”。

王亚南是现代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解放后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在大学执教三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办学经验，对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对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对如何办好综合性大学、如何培养和使用人才以及如何治学，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王亚南毕生从事教育与社会科学事业，四十年如一日。他一生著译四十一部，文章三百余篇，春风化雨，哺育了无数英才。晚年在“文革”的酷烈

考验中更是岁寒知松柏，彰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操守。

四、文学家——闻一多、冯文炳、胡风、叶君健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出身于浠水县一书香家庭，13岁考上留美预备清华学校，22岁（1922年）去美，到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画三年，却找到了他的诗人之笔。他历任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著名诗人、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

闻先生1923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对国学经典的整理与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下了很大功夫，其成果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愤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闻一多的诗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闻一多的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在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的闻一多先生追悼会上，朱自清先生评价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朱先生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对《楚辞》《周易》《诗经》《庄子》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遗著由朱自清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民间传说，闻一多新婚那天，亲友纷纷前来贺喜。好久了，还不见新郎，大家以为他更衣打扮去了。当迎亲花轿快到家时，人们才在书房找到他，原来他仍然穿着旧长袍在看书。家里人说他一看书就“醉”。

冯文炳（1901—1967），笔名废名，黄梅人。著名文学团体语丝社成员，周



作人的大弟子，现代小说家。

在我国现代文坛上，冯文炳是具有独立精神人格的作家和学者，可谓是楚地的一个奇才。1907年6岁时始入私塾读书，1911年入县八角亭第一高等小学读书，1916年到武昌入启黄中学就读，开始接触新文学。

1917年进入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其间深受“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1920年从省一师毕业后，任教于武昌完全小学，业余时间学写白话诗文，开始与周作人通信。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常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文学作品。1924年正式升入北大英国文学系，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25年10月冯文炳先生用“废名”的笔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以后陆续出版的有《桃园》《枣》《莫须有先生传》等。其作品多写故乡普通劳动者，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创的艺术风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返回故乡黄梅任中小学教员，其间他精研佛学，在冯氏祠堂里写成了《阿赖耶识论》一书。抗战胜利后，冯文炳于1946年重返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教授，讲授《外国文学名著》《现代文学》等课程，同时创作反映黄梅避难生活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冯文炳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中文系任教授。在吉林省工作期间，冯文炳主要从事文学教学和文学研究，先后讲授《写作实习》《杜诗研究》《鲁迅的小说研究》《新民歌》《美学》等课程。

作为京派小说家，其作品以田园牧歌的风味和诗化的意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而被人们称为田园小说和诗化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他受到古代诗词的影响。朱光潜说：“《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

关于冯文炳与熊十力先生的交游，学界曾传为美谈。废名与俞平伯、冰心等都是知堂先生周作人的得意门生。废名十分尊重他的同乡前辈熊十力先生，但在学问上则常与之辩难。每有争执，双方都面红脖子粗，废名拂袖而去。第二天废名再来，他们又和好如初，谈笑风生。这在北大传为笑谈。足见他们二人都如孩童赤子，一任感情自然流露。1936年，废名的儿子满周岁，熊先生还去拜访，送六块银元祝贺。1947年，熊先生在北大与废名同住，彼此见面，仍旧少不了唇枪舌剑。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蕲春人，著名文艺理论家、评论家、翻译家、诗人。现代文学史上“七月诗派”的代表人物。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1925年进北京大学读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到日本留学，参加日本共产党。

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5年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发“两个口号”的论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七月》被迫停刊，他另编文学杂志《希望》。在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论主观》和他自己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文，由此引起关于“主观”问题的论争和对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批判。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胡风当选文联委员、作协常委，并任《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他以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的建立。

1952年开始被批判。1954年，针对文艺问题提出30万言意见书，结果变成震撼全国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从此陷于冤狱。

1980年9月，中央作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平反后，胡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1988年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历史。

叶君健（1914—1999），湖北黄安（今红安）人，笔名马耳，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君健停下了自己的小说创作，投身到抗战的宣传工作中。1938年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同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辗转于武汉、香港、重庆等地，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外语，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香港主编英文刊物《中国作家》，又任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教师。他在这一时期所翻译的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后来被收为英语和世界语两个集子出版。

1944年，叶君健应英国战时宣传部邀请，任中国抗战情况宣讲员，到英国各地演讲，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并重新开始一度中断了的小说创作。抗战胜利后，叶君健在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进修，做欧洲文学研究员，用英语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无知的和被遗忘的》《蓝蓝的低山区》，长篇小说《山村》《他们飞向远方》等。这些作品都是出于向国外读者“解释中国”的目的而创作的。

1949年叶君健回到祖国，投身于宣传家的事业，历任辅仁大学教授、文化部外联局编译处处长、《中国文学》副主编，长期主编英文刊物《中国文学》。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主任，是民盟中央委员，全国